

## 後知之明：全球化浪潮中本土翻譯理論的建構

張上冠\*

### 摘要

本土的翻譯理論，在某個吊詭的意義上，其實是種「翻譯的翻譯理論」(translated translation theory)。我們鮮少努力的去嘗試從自己的翻譯傳統中汲取建構當代翻譯理論所需的養份，結果在不斷引介西方翻譯理論而缺乏反省的情形下，本土的翻譯理論事實上是在從事一種「重覆而無差異」(repetition without difference)的行為。

如果翻譯可以被視為一種意義交換的經濟活動—其中包括了意義的生產、包裝、行銷與消費(以及再生產)的過程—本土的譯/讀者大概只在裏面扮演消極的消費角色。我們不但只是經過翻譯代/加工過的「二手知識」的盲目消費者，我們甚至經常天真的以為這種知識是道地的「本土知識」。這種「透明翻譯」的現象讓翻譯淪為意義空轉的浪費行為，使得翻譯可以擁有的意義再生產的機會遭到剝奪。

然而翻譯做為一種 after-writing 暗示了「意義遲來的接觸」(belated encounter of meanings)。換句話說，翻譯雖然出現在原文之後活動，但是那個「在後」(a tergo)的位置卻可以發揮特別的功能，從而轉化/昇華原文的意義。因此就一個類比的關係而言，本土的文化位置就算是錯誤的被認為落後歐美先進國家，我們仍然可以藉由在後的力量成為後起之秀。更重要的是，當我們反思目前只有進口而無出口的理论窘況，也許我們應該從被我們拋棄在後的傳統之中，搜尋上述支持的力量來替本土的翻譯理論建構找出一條出路。

**關鍵詞：**本土、翻譯理論、反思、意義經濟、在後、差異

---

\*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副教授

## **Hindsight: Rethinking the (De)Construction of Indigenous Translation Theory in Taiwan**

Chang, Shang-Kuan\*

### **Abstract**

Ironically, th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y that prevails in Taiwan often comes in the form of “translated translation theory” that simply manifests itself in a constant act of “repetition without difference,” and consequently seems detriment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anslation enterprise. It is argued, however, that translation, as “after-writing” that always already presupposes a “belated” encounter of meaning between two languages, may exert the power of what Derrida has called “a tergo.” Hence it follows that if one can be more aware of the extraordinary position that translation takes up in the global economy of meaning and attempt to render the act of translation more meaningful in the sense of laying open, or rather producing, the difference, one should have no doubt that even a translated translation theory can give birth to progeny that out-shine/out-shadow its predecessors. In other words, in order to open up the possibility of difference and if we are to (de)construct a so-called indigenous translation theory, it is necessary that we look “back” on our long-ignored translation tradition and find out whether there lies for us a way out of the mire of contemporary “translated translation theory” in Taiwan.

**Keywords: indigenous, translation theory, rethinking, economy of meaning, a tergo, difference**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後知之明：全球化浪潮中本土翻譯理論的建構

張上冠

What is “familiarily known” is not properly known; just for the reason that it is “familiar.” When engaged in the process of knowing, it is the commonest form of self-deception ... to assume something to be familiar, and to let it pass [gefallen zu lassen] on that very account.

Georg Wilhem Friedrich Hegel, *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

As perception becomes habitual, it becomes automatic.

Victor Shklovsky, “Art as Technique”

## 1. (前言前的) 前言<sup>1</sup>

任何讀過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的“Outwork” (*Dissemination* 3-59) 的人應該不難瞭解「前言」(preface) 的特殊解構性。黑格爾 (G. W. F. Hegel) 他的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Mind* 所寫的〈前言〉裏，一方面視前言為“marginal comments”而加以反對，另一方面卻又隨俗的寫了一篇〈前言〉，並且／雖然在其中敬／警告其讀者：“Don’t take a preface seriously”，甚至明白的表示：“Don’t take me seriously in a preface” (qtd. in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x)。然而在史碧娃克 (Gayatri Spivak) 的解釋下，黑格爾的自我矛盾並非全然無理，因為矛盾來自前言所具有的雙重結構，結果使得前言同時反(對)／(回)應了自身的功能與目的。<sup>2</sup>換言之，前言一方面以其對主題所做的「系統性的摘要概述」<sup>3</sup>僭越了本

<sup>1</sup> 「(前言前的)前言」這個詞的出現讓「前言」這兩個字有必要被「置於刪除」(sous rapture/under erasure) 以開顯／隱閉其意義的「延異」(différance)。(前言前的) 這個詞中的(前言) 尚未實質成形 (the not-yet-realized)，卻已經像魅影幽靈般出現在論文的(第一個)前言之前，彷彿以無形之手在背後執行指導之工。這使得論文的(第一個)前言無法不成為一種前後顛倒的後語。那個(前言)似乎才是真正首先出現的前言。然而同樣矛盾的，在前的(前言)卻是在論文後面(第二個)前言的位置上才能實質出現。

<sup>2</sup> 史碧娃克指出黑格爾對前言所採取的正反兩面態度反映出下列兩種結構：preface/text = abstract generality/self-moving activity 以及 preface/text = signifier/signified。前者為反，後者為正，而式子中的“=”就是黑格爾式的「昇華」(Aufhebung) (xi)。

<sup>3</sup> “abstracted systematic statement” (Norris xiii)。這個片語是諾里斯 (Christopher Norris) 在他的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1982) 的「序論／緒言／導讀」(“Introduction”) 裏所寫的。

／正文的地位並且剝奪了本／正文的「自行活動」(self-movement)，然而在另一方面前言同時也可以和本／正文共構出某種「昇華」(aufhebung; sublimation/sublation)的關係，將自身「轉化」(aufgehoben; transform/translate)到本／正文之中並催化其意義 (Spivak x-xi)。如此一來，做為德希達所稱的“outwork”、“hors livre”、“extratext”、“foreplay”，前言和本／正文的內外或前後之別就可以被「廢止」(abolished)及／即提昇，進而使得兩者成爲一種辯證的關係而存在。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理解爲何實爲「後語」(post-face)的「前言」(pre-face)，在不斷「置換」(displacement)及「增補」(supplement)的活動中，其所引發的並非是一種「無謂的」(meaningless/saying nothing)意義重覆，而是一種自覺與反思—即一種特殊的「思想回／後顧」(looking/thinking back)及「重視」(re-examination)—彷彿在此前言的位置裏某些「真理的軌跡」(traces of truth)可以被展現出來。換句話說，這種自覺／反思的功能是鬆動、翻轉、改變我們「習以爲常」(habitual/familiar)因而頑強固執的「觀／聽方法」<sup>4</sup>，讓事物「慣常的」(ordinary)意義不再僵化我們對知識不斷且活躍的追求。

## 2. 前言<sup>5</sup>：題目的反思

如果慣常的意義所潛藏的我們思想的鈍化或者說「惰性」(inertia)可以經由反思的「行爲」(act/movement)予以解除，那麼在前言這個位置針對本論文的題目—那個看似理所當然且自以爲是的題目—實施自我反思的鬆動，這應該是件無可避免的必要之事。不過對於這種自我反思，我們仍然必須保持戒慎之心。因爲反思就時間次序而言，總是發生在某個先前的思想之後，所以反思「總已是」(always already)思想之「餘」(remainder)；但是反思同時也引發思緒的持續，也就是說反思「總已是」在某個後續的思想之前。就這一點而言，反思本身顯然是「前後兩端開放」(open-ended at both ends)：它既延續了舊有的思考又被繼續的更新思考所延續。反思這種同時在前又在後的現象表面上似乎是個「前後矛盾

諾里斯有意避用「前言」顯然是從「實際的行爲」來回應解構「理論」的要求。

<sup>4</sup> 史考勞夫斯基這位俄國形式主義者所提出的「陌生化」(ostraneniye/defamiliarization)也許可以做爲論文此處觀點的參照。關於「陌生化」，請參閱其“Art as Technique”，收錄於 Lee T. Lemon 及 Marion J. Reis 所編之 *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 (1965)。

<sup>5</sup> 或許「(前言前的)前言後的前言」這個戲謔的說法更能表達第一個注釋中對於前言具有的解構性質的說明。

的」(pre-post-erous)情形，但是這個「非比尋常的」(extra-ordinary)矛盾卻似乎可以提供一個知識的教訓：反思做為一種特殊意義下的「後設思考」(meta-thinking)並不具純然的完備性，反思之後的(反/再)反思並不能完全「取消」(cancel/foreclose)前(反)思；反思無法在一種絕對優惠的思考位置上來提供問題單一且完善的解答，反思反而是持續的「要求」(demand)各種可能的解答(甚至無解)<sup>6</sup>；換言之，沒有一種反思是可以「中斷」(我們該譯成 inter-rupt 還是 fore-close?)知識或意義的流動。在意義/思考之流的來回/來去的開放性<sup>7</sup>之中，反思的反一方面是種「返」，因為反思總是在企圖「返回」(return)到原先的思考之中而活動，但是反思的反在另一方面也是個「反」，因為在「返/回」(re-turn)的過程中，反思同時是個「反動的」(counter-active)翻轉力量。反思永遠意味著意義開顯/閉隱的可能及/即不可能或不可能及/即可能的無窮變化，而反思據此也無法保證能提供任何問題「一次且完全的」(once and for all)解決。有鑑於此，本論文的題目在初視一下看似確鑿無誤，然而在反思之後恐怕成為了有問題的題目，其明目張膽所宣稱的後知之「明」在隱約之中暗藏了後知之「冥」，隱然暗示著知識暴力的威嚇、知識彰顯的蒙蔽、甚至知識(可能)死亡的陰影。在這種情形之下，論文所標榜的「本土翻譯理論的建構」絕對不會是自明之理，因為這個建構的工作必定是個雙重意義的「不可能的任務」。<sup>8</sup>而題目所揭示的「全球化」、「本土」、「翻譯理論」等字眼無不要求我們另眼相看，彷彿它們的意義非比尋常，而我們必須以認真的態度予以再三的思量才能揣測問題的端倪與癥結所在，同時在論述的過程中，我們必須不斷的反覆思索以避免整個論證淪為一種虛假的「自我分析」(self-analysis)所形成的「套套邏輯」(tautology)的錯誤示範。

### 3. 問題：從中間開始

在一個不算弔詭的意義上，本論文以前面兩個奇特的前言做為論述的開始是

<sup>6</sup> 一種「懸解」(epoche)的可能？

<sup>7</sup> 也許不是很明顯的，論文此處企圖鉤連的意義指涉是德希達提出的 fort da 理論，阿爾默(Gregory Ulmer)稱其為一種「存活的特徵」(feature of survival)(49)。就思與反思以及再思與再反思的關係而言，fort da的活動催化了思想不斷的出現與其生命力的延續。

<sup>8</sup> 這雙重意義是：「不可能任務」(Mission Impossible/Impossible Mission)以及「任務：不可能」(Mission: Impossible)。

有其策略上的需要，因為這個安排實際上是企圖自我暴露論文論點的「兩難困境」(dilemma)：論文以建構本土的翻譯理論為目的，卻又不得不援引非本土的西方理論來做為破題的基礎甚至論證的前提。這一點似乎讓「本土」一詞的合法性難免遭受質疑，然而就一種自我辯護而言，黑格爾及史考勞夫斯基的引句顯然和翻譯理論無直接的關聯，這一點似乎又讓論文獲得某種藉口去詭辯翻譯理論的本土建構仍然是件可行之事。要處理這種矛盾—既要援用西方理論同時又要不受其所囿—我們或許可以嘗試從意義的生產、消費與再生產的過程中，意義的差異是如何出現這個方向去／來思考。對我們而言，這條路徑在討論如何建構本土翻譯理論上特別值得注意，因為它同時點出了有關翻譯的特質以及何謂本土理論建構的根本問題。

嚴格的來講，在台灣所謂「本土的翻譯理論」其實是個頗為弔詭的說法。它的矛盾之處在於本土的翻譯理論根本還是一種「翻譯的翻譯理論」(translated translation theory)，我們很少真正努力的去檢視我們的翻譯理論傳統並從中汲取建構當代本土翻譯理論所需的養份，因此我們的建構往往只是在「重覆而無差異」(repetition without difference)的情況下，以引介西方理論的方式來進行。這種「翻譯的翻譯理論」的出現，在某方面來看，是個無法避免的現象，因為在跨文化交流及全球化的過程中，知識／意義無休無止的隨時進行滲透、重組與變形，而翻譯在知識／意義的流動裏擔負著關鍵的門檻功能，因此沒有哪個知識系譜或意義系統是全然封閉且能躲開翻譯所引發的知識／意義「播散」(dissemination)。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也許更該注意的是翻譯經常是種形影無踪的意義交換經濟活動，因此翻譯所造成的影響（正如前面黑格爾的那句“gefallen zu lassen”所提示的）縱使四處瀰漫，卻往往令我們難以察覺其存在。在知識的「領受」(reception)上，翻譯讓接收者不知且不覺的情形常常形成了一種「二手知識」(secondhand knowledge)的消費現象；<sup>9</sup>也就是說，知識的接收者並不自覺這種經過翻譯的知識是在複雜的意義交換經濟活動中的產物，結果在

<sup>9</sup> 這種「二手知識」雖然是種「進口知識」—接近杜陵(Simon During)所說的「進口修辭」(imported rhetoric)(qtd. in Ashcroft, Griffiths, and Tiffin 164)—但是事實上卻是一種混同的知識，因為它既不是(翻譯前的)原先西方知識的忠實再現，也不該被認為是土生土長的本土知識。前者反映出的天真態度讓翻譯的功能成為神話式的：翻譯者無所不翻也無所不翻的完善，而後者顯露的無知則讓翻譯的中介功能全然消失，好像翻譯在知識的再現中從未發生。這兩種翻譯觀都導致某種「透明翻譯」(transparent translation)的現象，以為意義的圓滿性與立即性(plenitude and immediacy)在翻譯中可以毫無疑問的達成。在這一點上，妮蘭雅納(Tejaswini Niranjana)在*Siting Translation*中對「透明知識」(transparent knowledge)的討論(70-71)有相當參考的價值。

知識生產、包裝、行銷、分配、消費的過程中，許多接收者只在最後一個階段扮演著消極的消（費）級角色，並且誤認其所消費的（翻譯）知識是一種道地的「本土知識」<sup>10</sup>。反省的來看，這種錯誤的認知和翻譯做為一種 after-writing 卻經常被誤解的現象有關，因為相對原文而言，翻譯一般只被當成是個後來衍生的次要東西，而翻譯的目的／結果（aim/end）往往也只被要求是對原文做所謂的完全忠實的再現。結果本來該是 writing 具體實踐的翻譯卻在 after 特定貶抑的意義限制下—after: à la, in wake of, following, subject to, attached to, imitating, falling behind, etc.—喪失了其 writing 的身份。換言之，“translation as after-writing” 中的 writing 弔詭的只是指涉回到原文而非指向譯文；如此一來，譯文處在原文之後這個事實本來可以以一種「遲來／到的意義接觸（belated encounter of meanings）」這種「正面的」方式來瞭解。（因為延遲一旦發生，意義的變化可能即隨之而生，在後的翻譯反倒催生了原文意義的差異性），然而喪失 writing 身份的譯文卻讓這個延遲的效能顯得毫無作用，從而也使得意義不斷更新的可能遭到中斷。就前面所提及的把翻譯視為一種意義交換的經濟活動而言，延遲效應的失敗意味著翻譯成爲了意義的空轉，也就是說，翻譯在意義交換經濟中成了一種浪費的行爲，它不但讓知識消費者成爲盲目消費者去揮霍意義，它更使得知識經濟可能的循環再造與永續再生—簡單來說，知識的承傳接續及不斷發明—蒙受實質的傷害。

如果本土的翻譯理論是以上述「翻譯的翻譯理論」的模式被建構，也就是說，如果本土理論是建築在一種便利性的模仿抄襲之上，我們很難想像這種建構能有多少建樹，因為模仿在知識經濟的範疇裏大概只能佔有消極代工的位置，無法扮演充實的知識生產者而去積極的轉化知識的原料。再一次的，就翻譯做爲意義交換經濟的具體實踐而言，我們透過翻譯而加／代工的翻譯理論表面上看似乎厚殖了我們的知識經濟實力，但實際上卻仍然受制於西方理論，結果造成的是一種只有進口而「沒有出口」<sup>11</sup>的意義經濟現象。在這一點上，非常值得我們反省的是

<sup>10</sup> 我本無意讓「本土知識」（autochthonal/indigenous knowledge）和葛茨（Clifford Geertz）所提的「本土知識」（local knowledge）產生過度的聯想（請見其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但意義的流動卻使得兩者之間有一些蛛絲馬跡的脈絡可尋。簡單而言，這裏的本土知識對我而言總已是人類總體知識經濟下的活動；本土知識不可能在一個全然封閉的場域，以自足、排它，寡佔，獨有的方式獲致成形。論文此處只是對這種偏狹的看法提出批評。

<sup>11</sup> 「沒有出口」至少是以下兩個意義來瞭解：（1）只有進口而沒有出口的知識交換經濟所造成的逆差及（2）*No Exit*（1989）（Huis Clos），沙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主義名著。第一個意義反映了本土翻譯理論建構的現狀，第二個則反映了在意義短缺之下個人存在的焦慮。

翻譯做爲前面所提及的那種貶抑式的 *after-writing* 竟然和「本土」這個經常被視爲落後西方的文化位置形成一種詭異的對比，彷彿我們「天生」就該是西方知識的輸入國或意義的加／代工廠，而翻譯「自然的」成爲我們落後的標記。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就世界時區的分佈位置而言，台灣本土不但先於歐洲更是超前美洲各個所謂先進國家，難道這不表示我們的文化及歷史時間並不落人之後嗎？這種時區在前但是文化卻落後的「前後矛盾」現象讓我們不得不去思考翻譯做爲 *after-writing* 是否同樣陷入類似的矛盾之中。換個方式來說，就算翻譯真是出現在原文之後，這個「後」字難道只能以「負面的」意思來瞭解？難道我們不能對「後」施以某種意義的「轉換」(trope) 而使得這個表面上暗示時間落後的字眼展現某種「正面的」意涵？要回應這個問題，或許我們可以做一下論述的「繞道」(detour)，從德希達一本似乎無關翻譯理論的書中獲得一些啓發。在 *The Post Card* (1987) 一書中，德希達曾經以柏拉圖與蘇格拉底之間知識承傳接續的奇特關係做了精闢入裏的說明。對德希達而言，柏拉圖雖然是蘇格拉底的學生，但是在知識流動播散的過程中，在後的柏拉圖反而成了蘇格拉底本人以及其知識的「保存者」(pre-server)。<sup>12</sup> 沒有柏拉圖等於就沒有蘇格拉底；柏拉圖其實是讓蘇格拉底「倖存」(sur-vive) 下去的媒介。在一種微妙的意義上，德希達在 *The Post Card* 中是在探索一個翻譯理論建構的可能，因爲在他筆下的柏拉圖的確像是扮演了翻譯者的角色，透過柏拉圖的翻譯—不管是以一種亞克布慎所稱的「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或是我們當代所謂的「文化翻譯」(cultural translation) 來達成—蘇格拉底才得以存活在知識的流變之中，縱使存活下來的蘇格拉底，那位柏拉圖眼中的（或者更精確的來說，德希達眼中的柏拉圖眼中的一某種典型的 *mise-en-abîme*，不是嗎？）蘇格拉底，永遠不會相等於「真實的」蘇格拉底。<sup>13</sup>

對我們而言，德希達的教誨提供了本土翻譯理論的一個契機：雖然「翻譯的

<sup>12</sup> pre-server 的字首 pre-適當的說明了柏拉圖雖然位於蘇格拉底之（身）後，卻似乎早就註定是蘇格拉底知識的「（前）指標」(pre-cursor)。兩人饒富意義的相對位置可從德希達在《明信片》中複製的巴里斯 (Marion Paris) 所畫的那幅畫裏一探究竟。

<sup>13</sup> 在爲了回應／反駁瑟爾 (John Searle) 對他的「誤解」而寫的 “Limited Inc a b c ...” (1977/1988) 一文中，德希達寫了下面一段和論文此處的論點有所關聯的話：“The problem is rather that Derrida’s Austin is unrecognizable. He bears almost no relation to the original.’ This is true. But what is unrecognizable, bearing no relation to the original, is not simply Austin, but indeed ‘Derrida’s Austin’.” (Derrida 1988: 88)。同理，「真正的」蘇格拉底是誰？在哪？這個答案只能在知識／意義不可測的「深淵」(abyss/abyssos) 裏尋找。



翻譯理論」似乎讓我們陷入了一種表象的文化與知識的落後，但是這個饒富意義的「在後」位置卻有扭轉乾坤的功能，而如果我們能善加發揚其特性，「在後」將不會意味著落人之後，反倒有了後來居上或後起之秀的積極意涵。非常湊巧的，德希達在 *Glas* (1974) 裏也寫了一句和翻譯理論無直接關聯卻又藕斷絲連的話：“Everything is attacked from the back, written from behind. A tergo”(97)。<sup>14</sup>這裏的 a tergo 充滿想像空間，不論是在文化時間或空間位置的探討上都能提供令人省思的知識啓發，<sup>15</sup>因為它說明／暗示了「在後」的複雜性，讓「在後」變成了意義轉換的樞紐，成爲「開」啓各種可能差異的一扇門窗上的「關」鍵。

然而正如事物具有一體兩面性，契機或許帶來了解決問題的可能，但也可能併生新的危機。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遵循先前的論述的路徑來反思本土翻譯理論的建構問題，我們提出的解決之道似乎是利用翻譯做爲 after-writing 所具有的「在後」特性來逆／翻轉表面上落後的頹勢，以便讓「翻譯的翻譯理論」取得一定的差異利基而不致於墮入「無所謂」的困局。不過問題顯然並不如此簡單。我們在前面雖然指出要突破這個困局需要一種自覺的反思，可是反思的動力如果依舊還是源自另一套西方的理論—無論是有關翻譯還是無關，而這正是此論文本身一再企圖暴露的自相矛盾—我們是否仍能有效的避開東施效顰的窘況？<sup>16</sup>我們也許無法完全確定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嘗試去思考如何回答。

我們在前面援引了德希達提出的 a tergo 來解釋「在後」的顛覆特性。這個策略的運用主要基於一個詞源上巧合：此即引文中 attacked 這個字所具有的正反兩面性允許我們對其意義做出不同的詮釋，使得它一方面保持攻擊、襲擊、入侵等「正常」的意義，卻在另一方面被轉換爲和 attached 有關的，如連結、接觸、依戀等「反常」的意義（張上冠 7）。我們無法斷定德希達是否原來就有如此的暗示，但是我們可以相信他不會也不能不允許這種意義的播散。也正因爲如此，德希達的 a tergo—德希達自己的知識「鬼魅」(spectre)，不是嗎？—才有機會在他「身後」在我們討論本土翻譯理論的建構中產生沒有關聯（因爲原本無關翻譯）的關聯（因爲有關理論且經過「嫁接」“grafting”）。同樣的，論文前面所援引的

<sup>14</sup> Gregory L. Ulmez 的英譯。請見 “The Post-age.” *Diacritics* 11 (1981): 39-56。

<sup>15</sup> 請參閱我的一篇論文：〈前瞻後顧：反思跨文化交流的互動〉(2005)。

<sup>16</sup> 廖炳惠在他的〈在臺灣談後現代與後殖民論述〉這篇論文中，敏銳的指出「在此地談後殖民、後現代，事實上已有幾分新殖民的味道，是在推介或進口歐美理論。」(229) 廖的卓見適當的說明了東施效顰的部份矛盾所在。論文收錄於張京媛所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1995)。

黑格爾及史考勞夫斯基也可以說是在一種「暴逆的」<sup>17</sup> (abusive) 詮釋下展現這種無關卻仍有關翻譯理論的知識關係或是顯現某種特殊的文本互涉現象。然而有一點我們必須澄清，這種論述方式絕對不是規範式的，更不是去暗示它是在建構本土翻譯理論時所必須採用的「普通策略」(general theory)；它反而只是「一種」可能的策略（不論是以攻略或守略來看待）運用，其意圖主要是突顯意義差異的重要性以及在這一條產生差異的路徑上我們如何嘗試去維持反思的動力以推動意義的更新。

這個對意義差異的要求與期待—請允許我們再做一次論述的繞行—可以在米樂(J. Hillis Miller)的一篇論文“Border Crossings: Translating Theory”(〈越界：翻譯理論／理論翻譯〉)<sup>18</sup>裏獲得回響。米樂在論文中睿智的指出文學理論同時可以跨越又無法跨越不同語言及文化邊界的矛盾。<sup>19</sup>就一種類比而言，米勒的論點雖然環繞文學理論但卻同樣適用於闡明翻譯理論在跨／翻越語言及文化邊界時所引發的奇特現象：翻譯理論無法被翻譯，因為任何翻譯理論都有其無法被完全抹消的文化及語言的歷史「澱積」(sediment)；然而翻譯理論也無法避免不被翻譯，因為翻譯理論自身早已蘊藏一個內在的「目的性」(purposiveness)，自行要求翻譯，否則翻譯理論根本無法承擔翻譯(理論)之名，而拒絕被翻譯的翻譯理論只有自掘墳墓一途可走。要在上面這種兩難困境中尋找可能的出路—是的，可能的而非確定的，因為可能根本「沒有出路」(no exit)—我們或許可以嘗試走一條「絕路」(aporia)<sup>20</sup>，即找出翻譯理論自身可能的意義差異所在。就像一個生命的演變過程，從出生到死亡，每一個階段都不相同，但仍然是同一個生命的展現，即使是死亡也不過是生命意義差異的體現。對於翻譯理論，特別是在我們

<sup>17</sup> 「暴逆的詮釋」(abusive interpretation) 源自「暴逆的翻譯」(abusive translation) 這個名詞。路易士(Philip E. Lewis)在其論文“The Measure of Translation Effects”(1985)中援引德希達而提出這種強調自由翻譯的看法。把“abusive”譯成「暴逆的」是王葳真。請見其所譯之〈解構的翻譯〉；英文原作者為蓋洛普(Jane Gallop)，譯作載於《文山評論》1.4(2000.10): 1-21。

<sup>18</sup> 我把“Translation Theory”做了兩種不同但相關的中譯，主要的目的是突顯米樂的論文雖然和翻譯理論無關，但理論(的)翻譯一旦成為主題，理論的範疇當然就涵蓋了翻譯理論。米樂論文的原譯者是單德興，請見其所著之《跨越邊界：翻譯·文學·批評》(1995)。

<sup>19</sup> 在這個意義上，米樂的論文指涉了一個德希達在《The Ear of the Other》(1985)中所說的「雙重誡令」(double command)：“Translate me and what’s more don’t translate me.”(102)。換言之，我們無法不去翻譯翻譯理論，但是我們同時也無法將翻譯理論翻譯的完全「忠實」—如果「忠實」意味著百分之百且一對一的意義轉換。

<sup>20</sup> 將“aporia”譯成「絕路」當然不是絕對正確的譯法。「畏途」、「難局」(伍軒宏 176)或是「兩難困境」(劉自荃 58)都是(不)可行之道，然而不論是何種譯法都將把 aporia 的意義昇華到不同的境界。

本土所談的翻譯的翻譯理論，我們也許可以從這種不斷產生差異的角度去看待，讓翻譯理論在不斷被翻譯的過程中，自由的釋放差異的意義且自在的面對意義的差異。

#### 4. 後語：後顧之憂

如果前言本是後語，那麼後語成爲前言就並非是不可思議之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篇論文仍然只是一篇未完成的作品。不論是從解構或是詮釋學的角度來說，論文裏總是有一些未能詳盡或無能解決的東西在此論文的後頭要求在「更新」論述中獲得彰顯／隱蔽的機會。就實際的情況而言，論文在此處雖將結束，但是卻沒能履行題目原先所做的承諾，即建構本土的翻譯理論；整篇論文只對本土翻譯理論建構的問題做反思與一再的反思而無法獲致一個完善的解決之道。對於這個無法解決問題的問題，我們僅能提出下面的理由或藉口：寫作，或狹義的來說，論文寫作永遠都是在一種德希達式的「臨危瀕險」的寫作（*risky writing*）的情況下進行的。這可以解釋爲任何寫作的「背後」（*dos, back, behind, rear, posterior, a tergo*）總已潛藏著自我反思與自行解構的要求。就這篇論文而言，這個要求一方面迫使論者意識到自身知識的侷限，一方面則避免論文本身在僅僅是個人的、有限的、局部的反思處理之下，被誤認爲企圖對整個本土翻譯理論的建構提出規範性的完全策略。有鑑於此，這個被安置在論文結尾的後語只能預告一個新的開始將在論文（結束）之後展開。至於這個被賦予期望的開始將從何而來又如何而去，就並非任何人可以事先預見了。只不過當我們再次回顧論文前頭所提及的那個對於那深／遙不可測的未來以及在等待希望的同時，心中難免多少懸掛著一絲的遺憾與焦慮。<sup>21</sup>

---

<sup>21</sup> 這種遺憾與焦慮或許可以說源自一種候／厚殖民的症候群，因爲無論是候或厚殖民，兩者都反映出本土翻譯理論的建構中，我們對翻譯傳統的忽略。什麼是我們的翻譯史？什麼構成了我們的翻譯批評史？我們的翻譯理論與實踐是在何種歷史處境下成形的？這些問題都必須從對過去的翻譯歷史（糾纏的、混同的、異質的）做反思，並以現在的詮釋來爲未來而開展這個角度去尋求答案。在這層意義上，傳統落在現在的「後頭」這個事實或許更能讓我們注意到傳統的「價值」——一種知識經濟的利益，不是嗎？

## 引用書目

- 米樂 (J. Hillis Miller) 著。單德興譯。〈跨越邊界：理論之翻譯〉。《跨越邊界：翻譯·文學·批評》。台北：書林，1995。13-32。
- 伍軒宏。〈不死鬼：德希達的禮物〉。《中外文學》33.6。(2004年)：171-86。
- 張上冠。〈前瞻後顧：反思跨文化交流的互動〉。首屆海峽兩岸翻譯與跨文化交流研討會。北京：清華大學，2005。
- 廖炳惠。〈在台灣談後現代與後殖民論述〉。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1995。
- 蓋洛普著 (Jane Gallop)。王葳真譯。〈解構的翻譯〉。《文山評論》1.4。(2000年)：1-21。
- 諾里斯 (Christopher Norris) 著。劉自荃譯。《解構批評理論與應用》。台北：駱駝，1994。
- Ashcroft, Bill,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eds.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3.
- Derrida, Jacques. *Of Grammatology*. Trans. Gayatri Spiva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74.
- . *Glas*. Paris: Galilée, 1974.
- . "Outwork." *Dissemination*. Trans.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1.
- . *The Ear of the Other*. Ed. Christie V. McDonald.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5.
- . *The Post Card: From Socrates to Freud and Beyond*.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6.
- . "Limited Inc a b c..." Trans. Samuel Weber. *Limited Inc*. Evanston: Northwestern UP, 1988.
- Geertz Clifford.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a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Mind*. Trans. J. B. Baillie.

- New York: Harper, 1967.
- Jacobson, Roma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On Translation*. Ed. R. A. Bower. Cambridge: Harvard UP, 1959.
- Lemon, Lee T. and Marion J. Reis. eds. *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1965.
- Lewis, Philip E. "The Measure of Translation Effects."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Ed. Joseph Graham. Ithaca: Cornell UP, 1985.
- Miller, J. Hillis. "Border Crossing: Translating Theory." *EurAmerica*. 21.4 (1991): 27-51.
- Niranjana, Tejaswini.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92.
- Norris, Christopher.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Methuen, 1982.
- Sartre, Jean-Paul. *No Exit*. Trans. Stuart Gilbert. New York: Knopf, 1989.
- Shklovsky, Victor. "Art as Technique." Lemon and Reis 3-24.
- Spivak, Gayatri. "Translator's Preface." *Derrida* (1974): ix-xc.
- Ulmez, Gregory L. "The Post-age." *Diacritics* 11 (1981): 39-56.